

操《苦寒行》：“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树木何萧瑟，北风声正悲。熊黑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。”写其北征高幹军途中所见之景。蔡琰《悲愤诗》“边荒与华异，人俗少义理。处所多霜雪，胡风春夏起。翩翩吹我衣，肃肃入我耳。”为其被掳入南匈奴之见闻，形象地写出边地与内地景色之不同及主观感情。王褒，庾信由南入北后所作边塞写景之作，也属这写实之一类。如王褒“度冰伤马骨，经寒坠节旄”（《入塞》），“塞禽唯有雁，关树但生榆”（《出塞》），“尘飞连阵聚，沙平骑迹多”。（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），“天寒光转白，风多晕欲生”。（《关山月》），“庾信，‘关山连汉月，陇水向秦城。笳寒芦叶脆，弓冻絃鸣’（《出自蓟北门行》）”，“胡笳遥惊夜，塞马暗嘶群”（《和赵王送峡中军诗》），“阵后云逾直，兵深星转高”，“塞迥翻榆叶，关寒落雁毛”（《侍从徐国公殿下军行诗》），在边塞景物描写上达到了质朴与精致的一致，为他们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入北后亲身经历相结合之产物。另如斛律金所作鲜卑族民歌《敕勒歌》“敕勒川，阴山下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。为出于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之少数民族之手。写天、写山、写川、写大草原、写风、写牛羊，苍茫博大，毫不雕琢，自然浑厚，纯是天籁，为写边地之景中不可企及的珍品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。而此时期占多数的作者未亲历边地而作的边塞写景之作，虽为虚构，凭想象而成，一般来说也相当精巧。如张正见“沙漠飞恒暗，天山转积寒”（《雨雪曲》）“高柳横遥塞，长榆接远天”（《星名从军诗》），陈叔宝“禽飞暗识路，鸟转逐征蓬”（《陇头水》）“城遥接晕高，洞风连影摇。寒光带岫徙，冷色含山峭”（《关山月》），江总“绕阵着狐迹，依山见马蹄。天寒旗彩坏，地暗鼓声低”（《雨雪曲》），绘景绘色，可谓笔触细腻，微妙微妙，这不能不归于这些诗人诗歌技巧的高超。

最后，此期边塞诗开始将女性与征战联系起来，

使闺阁与边塞相结合。边塞之作中写征人思妇者，古已有之，但一来所涉及者寥寥无几，二来多将征人思妇两方面割裂开孤立地写。而此一时期，这两方面开始经常出现于同一首诗中，既写边塞征战，又写闺阁之怨，成为一时风尚。如萧纲《从军行》先写战事之艰苦，最后是想象妻子迎接其自边塞归来，“何时反旧里，遥见下机来”。陈叔宝《陇头》始为“陇头征戍客，寒多不识春”。末为“四面夕冰合，万里望佳人。”其《关山月》先渲染“戍边岁月久”，边地苦寒，月光西移，最后由看月幻化为对女子之思念，“看时使人忆，为似娇娥照”。徐陵《关山月》更可说是写了一连环思念。“关山三五月，客子忆秦川”，由十五明月触发征人思家之情。“思妇高楼上，当窗应未眠”，征人思念妇人，而作为征人思念对象的思妇亦在思念征人，以至夜不成眠（当然是征人想象之词）“星旗映疏勒，云阵上祁连”，思念由征人→思妇→征人，最后又归回到思念之主体征人，又归到边塞战地，十分感人。王褒的《燕歌行》更将塞北苦寒与江南佳景，征人苦辛与闺中幽思——对照，形成强烈对比，而并非仅是“妙尽塞北苦寒之言”（《北史·王褒传》）。更有部份此类诗作已并非简单地代征人立言，重心放在边塞，而将描写角度转为以女主人公为主。如柳惔《度关山》即已将重心转到闺阁，写女性对征人之思念。闺阁与边塞结合，女性大量进入边塞诗，无疑扩展了边塞诗的艺术容量，也有助于揭示战争的残酷无情。而这一变化的起因，主要乃南朝后期宫体诗人普遍涉足边塞诗创作，将宫体诗的艺术手法运用于边塞诗写作所致。

从魏晋至隋代边塞诗数量、形式、手法和题材等方面的发展和特点，可以看出，边塞诗已由相对粗糙，相对随意进入了初步成熟，基本定型的阶段，这数百年，在边塞诗发展史上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。它为随后即将来到的唐代边塞诗的高潮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作好了必要的准备。

龚定庵诞辰二百周年有感

钱塘潮起大音声，复本病梅觉春深，
一箫一剑识生平；化泥落红发华新；
忧患但悲千夫泪，于今尽枝著烂漫，
情豪始惊万马暗。装点西湖独风韵。

（王杏根）